

研究韩国现代化模式对中国现代化具有特殊借鉴意义

胡 皓

(上海海运学院 社会发展研究所, 上海 200135)

[摘要] 从60年代初开始,韩国经济实现了连续30多年持续的高速增长,从而成功地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在此期间,它成功处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必不可免的各种矛盾与冲突,成功地应对了城乡差别,实行了“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实现了儒教文化与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的良性互动与有机融合。因此,研究韩国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现代化具有特别的效仿与激励意义。

[关键词] 韩国;现代化模式;中国;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 F1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3)06-0030-02

就国际关系中对中国的战略意义而言,韩国与美国、日本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全国各地的“美国研究所”只有6家^①,日本研究所也只有13家^②,各地高校与社会科学院建立“韩国研究所”或“韩国研究中心”的数量却达17家之多^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的“韩国研究热”呢?

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启动现代化的进程中,与拉丁美洲和南亚相比,东亚的出色表现与迅速崛起,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生活中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引起了全世界许多机构与学者的极大兴趣,1993年世界银行甚至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长篇专题报告^[1]。此处的“东亚”,指的就是人们常说的“亚洲四小龙”,即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与新加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韩国研究热”,也是在全世界对“东亚奇迹”关注的大背景之下形成的。在“亚洲四小龙”中,中国大陆对韩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因而研究韩国现代化模式对中国现代化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

第一,韩国现代化取得的成就,对中国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具有特别的效仿与激励意义。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结束时,韩国的经济甚至低于二战之前的最好水平,人均GDP才83美元,并不比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稍好一点。然而,从60年代初开始,韩国经济实现了连续30多年持续的高速增长,到1996年,人均GDP一跃突破1万美元大关,被吸纳为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一“世界富国俱乐部”的成员,从而成功地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期望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完成现代化,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韩国在30多年中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成功经验,象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对中国的政府、学者与广大民众。

第二,欧美等国完成现代化,一般都经历了一百多年甚至数百年的历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必不可免的各种矛盾与冲突,是在这一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步暴露并得到解决的。然而,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启动的“后现代化”,一般都是要将上述“先发现代化”国家在一百多年甚至几百年完成的历史任务,“压

① 它们所在的高校或社会科学院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共6家。

② 它们所在的高校或社会科学院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延边大学、河北大学、山西大学、重庆大学及河南大学,共13家。

③ 它们所在的高校或社会科学院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延边大学、黑龙江大学、辽宁大学、山东大学、青岛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及上海浦东韩国研究所,共17家。

缩”到短短的几十年中“突击”完成。这种“突击追赶”式的现代化,也将“先发现代化”国家在数百年中逐步暴露并逐步得到解决的矛盾与冲突,“压缩”到几十年内集中或接二连三地暴露出来。最典型的,如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经济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的矛盾,国家主权与对外开放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等等。当所有这些矛盾接二连三甚至是一下子都涌到发展中国家政府面前的时候,政府经常陷于一种左右为难、顾此失彼的“两难境地”,这或许可以被称作“后发现代化的悖论”。例如,追求起点公平的效率与追求结果公平的社会保障两者都是现代化需要的,但至少在一定时期,它们又恰好是直接矛盾的。如何将直接矛盾的两方面有效地兼顾与整合起来,这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领导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功”。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都是在这类“两难困境”面前应对失当而导致现代化“受挫”。与拉丁美洲、南亚和某些东南亚国家相比,“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也在于它们在处理这一系列“两难困境”中的出色表现。而韩国在其中又完全可称为一个成功的典范。它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自然是中国学者想竭力探寻的。

第三,撇开中国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各种特殊性不论,相比较新加坡与中国的香港,它们都属于城市型的国家或地区,基本不存在城乡差别问题。

而韩国由于人口与领域面积所决定,城市与乡村的地区差异、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的差异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众所周知,城市与乡村之间地区发展的显著不平衡、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之间状况的显著不平衡,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因而,就如何成功地应对这方面的挑战而言,韩国现代化模式对中国现代化的借鉴意义,显然是新加坡与中国香港不具备的。

第四,按照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内外研究者几乎完全一致的共识,保证“后发现代化”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必须有一个既有现代化取向又有权威的政府,将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与政府的恰当干预有效地结合起来。

这一点,近几十年来,实际上已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政府与有关学者所广泛接受,甚至成为一项基本共识。

韩国现代化模式的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韩国“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起飞中成功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引导与组织作用。按照世界银行专题研究报告的评价,政府运用所建立的一套组织机制“得以为有选择的干预制定出明确的计划与运行标准并监督其运营”,其宏观经济管理“极为出色”。于是,韩国政府如何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渗透于其中,积极制定产业政策与经济计划,精心培育企业家阶级,这些,也成为中国大陆学者想极力探究的“奥秘”。

第五,按照海内外学者基本一致的看法,东亚模式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同处所谓的“儒教文化圈”。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基督教新教反对自我放纵、倡导自我克制与自我监督,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在欧美国家的发展。而现在看来,儒教文化重视人的“今世”现实关系的传统,无疑使人们的“勤劳”、“敬业”与吃苦耐劳、节俭储蓄习俗成为更为现实、强大与持久的推动力。儒家尚贤重教的传统转化成为现代“教育优先”的原则,儒教文化家族本位思想与家族伦理秩序在现实生活对克服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凝聚人心,形成团队主义精神具有积极意义,适应了“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需要。

在所谓的东亚“儒教文化圈”中,韩国现代社会中对儒教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扬是最为突出的,甚至比起在儒教文化发源地——中国的现代生活中的作用,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反过来向昔日自己的“学生”学习,研究韩国现代化过程如何传承儒教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其与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等现代经济、政治与文化因素的良性互动与有机融合以有力地推动现代化进程,自然也成为中国学者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 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Z].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5.

[2]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亚洲发展国家和地区

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汇编(1992)[Z].

[3] 世界银行. 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Z].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齐琳)